

# 蘇聯「繼承」問題之研究

趙春山

## ——論克里姆林宮的權力轉移

壹、導言  
 一、列寧的繼承問題  
 二、史達林的繼承問題  
 三、赫魯曉夫的繼承問題  
 四、勃列日涅夫的繼承問題  
 五、安德波夫的繼承問題  
 陸、利益衝突的調和者  
 柒、結論

參、史達林的繼承問題  
 一、赫魯曉夫的繼承問題  
 二、勃列日涅夫的繼承問題  
 三、安德波夫的繼承問題

肆、赫魯曉夫的繼承問題  
 一、勃列日涅夫的繼承問題  
 二、安德波夫的繼承問題

伍、勃列日涅夫的繼承問題  
 一、安德波夫的繼承問題

陸、安德波夫的繼承問題  
 一、利益衝突的調和者

## 壹、導言

「繼承」(succession)一詞運用到現代政治現象時，它指的是某一個人或團體，在一個制度或環境下，對一個政治職位的繼承，以及此繼承過程對一個民族國家的政治體系之結構和政策，所造成的影響<sup>①</sup>。當我們探討蘇聯政治體系的「繼承」問題時

① 有關現代民族國家繼承問題的一般性討論，參看 Dankwart A. Rustow, "Success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8 (1964), No. 1, 104-13. Quoted in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65.

，本文採取的是畢亞勒(Seweryn Bialer)教授提供的定義。它專指「最高領袖(即共黨總書記)被黜、退休、或去世之後，一直到新領袖的權力地位出現或穩固，這段期間的政治生活型態，以及這些型態對政策造成的影響。」<sup>②</sup>

蘇聯政治體系的「極權主義」特質，使得「繼承」問題在研究蘇聯政治發展時，顯得非常重要；而在評估和分析這一問題時

① 有關現代民族國家繼承問題的一般性討論，參看 Dankwart A. Rustow, "Successio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8 (1964), No. 1, 104-13. Quoted in Seweryn Bialer, *Stalin's Successor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Soviet Un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65.

，本文採取的是畢亞勒 (Seweryn Bialer) 教授提供的定義。它專指「最高領袖 (即共黨總書記) 被黜、退休、或去世之後，一直到新領袖的權力地位出現或穩固，這段期間的政治生活型態，以及這些型態對政策造成的影響。」<sup>②</sup> 蘇聯政治體系的「極權主義」特質，使得「繼承」問題在研究蘇聯政治發展時，顯得非常重要；而在評估和分析這一問題時，遭遇的困難也就相形增多。其理由何在，畢亞勒教授有下列一段精闢的描述：

「沒有一套預先確立最高領袖執政期限的規定。既缺乏一套涉及職位任期的規定，提供每一個執政者那些相似的權責、權力和影響力，也沒有前例可循作為在位者讓與權位的標準。最重要的是，在選擇新領袖，以及新領袖隨後在穩固其地位的過程中，蘇聯較其他民主政治或權威性軍事政權，更難預測和更不確定。這種情況為整個蘇聯政治過程，注入一些較其『正常』時期運作的那些特點，更無法預測和不定因素。」<sup>③</sup>

儘管面對這些困難，西方學者仍舊努力運用各種研究方法，意圖解開這個環繞克里姆林宮的謎團。舉例而言，布瑞斯勞爾 (George W. Breslauer) 教授針對史達林和赫魯曉夫死後的繼承問題，認爲蘇聯的繼承政治，具有下列三個面相 (aspect)：

第一，史達林死後的蘇聯政治繼承，其過程歷時甚久，一般長達七年時間；

第二，雖然我們無法確切地了解，這兩個繼承時期的轉捩點在什麼時候；但我們可以意識到每一個繼承時期都包含了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爲時約四年，其特徵是各種敵對政策的雜相並陳，權力鬭爭和政策歧見相互糾纏；第二個階段爲期三年，其特徵是新的黨領袖脫穎而出，對內進行結構的廣泛改組和預算的重新分配。對外則主動增進與美國的和協關係。

第三，繼承的型態，證明了所謂「後史達林共識」(post-Stalin consensus) 的說法，繼續具有重要的價值<sup>④</sup>。畢亞勒教授在研究布里茲涅夫的繼承問題時，也提出了他的分析架構：首先，畢氏認爲應該探討繼承可能引起的人事變遷，要注意其改變的幅度和型態；其次，他認爲應該檢視繼承期間的政策意含。換言之，研究一下那些重要的議題可能留待繼承期間去解決，至少必須在當時列入考慮；最後，必須分析未來發生繼承問題的組織和程序的架構，以及在繼承的影響下，此架構變動的傾向<sup>⑤</sup>。

上述兩位學者提出的架構，提醒吾人在分析蘇聯繼承問題時，應該注意人事、政策和組織三項因素；同時應了解，這些因素並非單獨存在，它們彼此之間具有密切的關聯性。但對筆者而言，魯斯 (Myron Rush) 教授的意見，最具有參考的價值。魯斯

② Bialer, *op. cit.*, p. 65.

③ *Ibid.*, pp. 65-66.

④ George W. Breslauer, "Political Succession and the Soviet Policy Agenda," *Problems of Communism*, May-June 1980, pp. 34-36.

⑤ Bialer, *op. cit.*, p. 68.

將蘇聯的繼承過程，分爲三個「階段」(Phases)，說明其繼承危機時期的一些特點：

在第一個階段，主要特點是涉及前統治者權力的再分配問題，這是一個動盪不安的環境。某一個人可能試圖藉機獨控全局，集大權於一身；

如果出現第二個階段，則將是一個權力分享或「寡頭政治」(oligarchy)的時期。這是一個不穩定的集體領導，企圖獲取個人統治的威脅情況仍然存在；

第三個階段也有可能出現，這是新統治者穩固其權力的時期，其發展的過程將視前二階段的情況而定<sup>⑥</sup>。

對筆者而言，本文主要的關切所在是在繼承時期，蘇共領袖爲了獲取權力而引起的權力鬭爭問題。因此，魯斯的分析架構值得加以參考。

史達林死後，研究蘇聯領導政治(Leadership politics)的西方學者，大致分爲兩派意見：一派強調領導政治的衝突因素；另外一派較爲傳統的說法則認爲，當政治人物成爲一個公認的政權領袖後，其領導過程則呈現出穩定的特色。在此我們應指出的是，即使第二派意見沒有將衝突視爲蘇聯政治生活的一個持續和重要的事實；但他們也承認，權力鬭爭在爭取領導權位的繼承時期，佔有重要的地位<sup>⑦</sup>。這是支持本文假定的重要論點。

其次，我們確信在共黨世界中，權力是可欲的，而個人權力的獲得，更和其領導地位的穩定息息相關。換言之，權力是共黨領袖統治的合法性工具；其「合法性」的程度也常常因其政治權力的消長而有所不同。

在蘇聯，領導人物權力的專斷和排他性，有其歷史的根源。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II)就曾宣稱：「至高無上的專制權力屬於全俄羅斯的皇帝。」他並重申：「對俄皇權威的服從，不但爲了害怕天誅，同時也是因爲出自良知，因爲這是上帝的旨意。」尼古拉二世的上述說法，似乎像是反映了「恐怖伊凡」(Ivan the Terrible)的主張。後者認爲：「俄羅斯的統治者，不僅不會對任何人負責，同時可以任意獎賞或處罰其子民。」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更是強調：「專制王朝不需要爲世界上任何人解釋其行爲，它反而像基督根據其意志和判斷主宰世界那樣，具有權力和威望來治理它的國家和土地。」<sup>⑧</sup>

⑥ Myron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5), pp. 140-141. 魯斯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了研究蘇聯領導政治的三個名詞，作爲其「三階段」架構的代表：「寡頭政治」(Oligarchy)、「有限的個人統治」(limited personal rule)和「專制的個人統治」(despotic personal rule)。根據他的說法，其「寡頭政治」的權力運作，應是本文討論的重點。參考 Myron Rush, "Breznev and the Succession Issue," *Problems of Communism*, July-August 1971, pp. 9-15.

⑦ Carl A. Linden, *Khrushchev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 1957-1964*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p. 2-3.

⑧ Quoted in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4.

蘇聯共黨領袖對於運用權力的認知，可能受到上述帝俄沙皇傳統的影響，其不同點只是以共黨意識形態取代宗教神話，作爲權力的源泉。雖然從帝俄時代以來，我們也看到許多法令規章，但它們只是獨裁者御用的工具而已。瓦尼曼(Peter Vanneman

② Carl A. Linden, *Khrushchev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 1957-1964*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p. 2-3.

③ Quoted in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4.

蘇聯共黨領袖對於運用權力的認知，可能受到上述帝俄沙皇傳統的影響，其不同點只是以共黨意識形態取代宗教神話，作為權力的源泉。雖然從帝俄時代以來，我們也看到許多法令規章，但它們只是獨裁者御用的工具而已。瓦尼曼 (Peter Vanneman) 教授即曾明白指出：「俄國的法律傳統是在一個特殊的，無組織的形態下發展的，它一向屬於行政機構的附屬品。俄國的法律並非源自於大眾的同意，也不是出自習慣的演進，而是屬於沙皇的欽命。」<sup>④</sup>

對共黨領袖而言，法律不是限制權力的行使，而是為權力服務的工具。

權力也是共黨政治理論的一個重要概念。蘇聯政治學者柏拉茨基 (Fyodor Burlatsky) 認為：「權力是一個人人在社會生活中實現其意志，必要時將其意志加諸他人的真正能力；作為權力的重要表示，所謂政治權力，它描述的是某一階級，團體或個人實施其意志的真正能力，並透過政治和法律規範表達出來。」<sup>⑤</sup> 共黨領袖也許不重視權力的理論層面，但他們必然了解權力在政治運作中的角色。以列寧為例，他就指出權力問題不容規避和忽視，因為「它是決定一個革命的發展，其外交和內政的任何事務的關鍵問題。」<sup>⑥</sup>

我們從蘇共發展的歷史過程看，蘇聯共黨本身即是派系鬭爭下的產物。派系鬭爭的目標是爭取領導權力。為什麼一定要透過衝突的過程才會達到權力的高峯？換言之，為什麼權力鬭爭構成蘇聯領導政治的一項特色呢？除了上述畢亞勒所說，蘇聯缺乏一套選擇繼承人和領導幹部的標準規則外，部分原因來自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馬克思的觀念中，階級鬭爭是重要的概念，鬭爭是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常態。除非達到他心目中的「理想天國」，屬於烏托邦的共產主義社會，鬭爭是不會停止的。在這種前提下，政治被認為是敵對勢力間的生死鬭爭，類似於列寧所謂的「誰對付誰？或誰打倒誰？」 (Kto Kogo?) (Who whom? or, Who wins?) 的名言。如果從西方所謂的「博奕理論」 (game theory) 看，這是一種「一方所得即他方所失」的「零和對局」 (Zero-sum-game) 狀態。

此外，造成衝突潛在危機的是蘇聯缺乏一套明確和規律性的方法，來解決領導團體中的權威和決策問題。儘管蘇聯有共黨黨章和憲法等裝飾，但領導團體之中，無論是個人和統治機構之間，彼此間的關係並沒有劃分清楚。黨政高層機構，諸如黨「中央委員會」，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部長會議」，以及「最高蘇維埃主席團」等，它們的功能分割也沒有明白說明。

因此，蘇聯政治的邏輯變成，領袖必須尋求超越領導團體的絕對權力；同樣的邏輯也促使其他人阻止或防止主要領袖獲取此

④ Peter Vanneman, *The Supreme Soviet: Politics and the Legislative Process in the Soviet Political System* (Durham, North Carolina: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 22.

⑤ Fyodor Burlatsky, *The Modern State and Politics*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8), p. 21.

⑥ V. I. 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25, p. 366.

絕對權力。在這種情況下，一個蘇聯領導人物必須不斷地努力防止其周遭集結的權力威脅到他本身<sup>②</sup>。

既然個人領導權力在蘇聯政治舞臺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我們試從權力鬭爭的觀點，分析一下列寧死後的蘇聯繼承問題。

## 貳、列寧的繼承問題

作為布爾什維克黨和蘇聯這個國家的創建者，列寧領導地位的合法性 (legitimacy) 來自他個人的「神化權威」 (Charismatic authority)。列寧不但從馬克思主義當中塑造一套配合俄國歷史傳統的意識形態，並且將它和革命行動結合起來。列寧和他的追隨者確信：透過此理論和行動的整合，他們可以推翻既有秩序而實現其所謂的「歷史使命」<sup>③</sup>。

根據韋伯 (Max Weber) 的說法，這種根植於原始領袖的「神化」人格特質，最後可能趨於「例行化」 (routinization)。換言之，「神化」特質可能制度化於某一職位，並且由於既定的繼承規則，此「神化」可以由一個接班人傳到另一個接班人而不論其個人的資質如何<sup>④</sup>。

韋伯的觀點顯然沒有在俄國獲得驗證。事實上，列寧的個人「神化」，不但沒有在任何黨的領導職務中獲得制度化，也未能傳給其繼承者。在蘇聯的高級黨幹中，沒有一個人能繼承列寧非凡的「神化權威」。韋伯的「例行化」概念可能在列寧「個人崇拜」的形式中表現出來，但它不但無助於未來的繼承過程，反而使其更為複雜化<sup>⑤</sup>。

### 一、列寧遺囑和「三頭馬車」

早在列寧病故之前，有關他的繼承問題，即出現在克里姆林宮的政治舞臺上。在列寧執政期間，他的正式官銜是「人民委員會」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s) 的「主席」。雖然列寧在黨裏面沒有任何頭銜，但透過他對黨組織的控制，仍能集黨政大權於一身。當時，環繞列寧左右的助手包括「政治局」 (Politburo) 的其他六名成員：托洛茨基 (Leon Trotsky)、史達林、季諾維也夫 (Georgi Zinoviev)、卡米涅夫 (L. B. Kamenev)、李科夫 (Alexei Rykov) 和托姆斯基 (M. Tomsky)

<sup>②</sup> Linden, *op. cit.*, pp. 11-15.

<sup>③</sup> Teresa Rakowska-Harmonie, "Toward a Theory of Soviet Leadership Maintenance," in Paul Cocks, Robert V. Daniels, Nancy Whittier Heer, ed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54.

<sup>④</sup>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1947), pp. 364-371.

<sup>⑤</sup> Robert C.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79-1929*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3), pp. 304-305.

。這些人大都在黨政機構擔任要職<sup>⑥</sup>。

在列寧血管疾病病發前，布黨政權尚能維持穩定。

Whittier Heer, eds., *The Dynamics of Soviet Polit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54.

② Max Weber, *The Theory of Social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 (New York, 1947), pp. 364-371.

③ Robert C.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1879-1929*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3), pp. 304-305.

。這些人大都在黨政機構擔任要職<sup>②</sup>。

在列寧血管疾病發前，布黨政權尚能維持穩定，但當列寧一九二二年五月第一次病發後，整個政治情勢即因其養病減少過問政事而發生變化。第一回合的權力鬭爭由史達林和托洛茨基揭開序幕。

在黨內，托洛茨基的聲望僅次於列寧，他在十月革命和俄國內戰中表現傑出。由於創建紅軍和擔任「人民委員會」的「軍事委員」，他在軍中獲有廣大支持。此外，在「共青團」(Komsomol)，在黨的計劃階層和政府經濟部門中，托洛茨基也頗負衆望。因此，他的多彩多姿的個人經歷和才氣橫溢，被大家認爲是列寧心目中的最佳繼承人選<sup>③</sup>。

雖然托洛茨基獲有列寧的支持，但他發現本身很快就在黨領導階層中處於孤立狀態。另一方面，在史達林的陰謀策劃下，他組成了包括季諾維也夫和卡米涅夫在內的「三頭馬車」(troika)，企圖利用列寧臥病期間，控制黨政決策。

史達林的權力慾，以及他和托洛茨基之間派系鬭爭對於共黨團結可能形成的傷害，很快就引起列寧的關切。這點我們可以從日後公布的「列寧遺囑」(Lenin's testament)中，獲得一些證據。

列寧表示：自從史達林擔任總書記後，其權力愈來愈大。列寧懷疑，史達林是否能永遠持謹慎的態度來運用他的權力。在列寧心目中，史達林是個「粗暴的人物，由於身任總書記一職，此一缺點是令人難以忍受的。」因此，列寧建議其黨內同志設法將史達林調離其職位，另外找一個「更有耐心，更爲忠誠，對同志更有禮貌，更體諒別人，並且不太善變」的人，來取而代之<sup>④</sup>。

列寧認爲史達林和托洛茨基的爭論是「構成黨內分裂的最大危險。」但列寧在其「遺囑」中對黨內重要領袖人物一一作了批評後，覺得其中沒有一個人足堪大任，成爲他的繼承人。在這種情況下，列寧建議增加共黨「中央委員會」的成員。認爲此舉可以提高「中委會」的聲望，改進行政機構的工作，並可防止因爲派系之間的爭權而導致的衝突<sup>⑤</sup>。

列寧的「遺囑」並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當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雅(Nadezhda Krupskaya)十七個月後把列寧的遺囑信函交給卡米涅夫後，後者將之轉交給包括史達林在內的三人小組，以及另外三名非「政治局」成員。三人小組把這件事提交「出席黨大會代表的領袖們」，後者不但決定保留史達林的總書記職位，並且決定不將信件送到列寧心目中收信者——黨大會手中<sup>⑥</sup>。因此，列寧的「遺囑」直到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次大會時，才由赫魯曉夫正式予公佈。

④ 例如季諾維也夫擔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史達林擔任共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托洛茨基擔任「軍事委員」。季諾維也夫則主管「共產國際」事務。

⑤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 33. See also Leonard Schapiro, *Th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8), p. 48.

⑥ Robert C. Tucker, ed., *The Lenin Antholog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75), pp. 721-728.

⑦ Ibid., pp. 726-727.

⑧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p. 23-24.

## 二、史達林的奪權戰略和建立「個人」獨裁

列寧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去世。他的死，使蘇聯進入一個不穩定的「寡頭政治」或「集體領導」時期。其特色誠如魯斯教授所形容那樣：任何人都沒有能力阻止其反對的政策被付諸實施；「政治局」的成員表面上平靜，但派系聯盟的改變仍有可能造成寡頭政治的不安；「政治局」的權力鬭爭也有可能擴至「中委會」；個人在這段時期的政治鬭爭目標是：影響黨政雙方有關政策和人事的決定；加強自己的派系實力並阻止其他派系力量的增長；加強本人在派系中的地位並阻止其他人獲得主宰本派系的權力<sup>②</sup>。

從組織的觀點看，列寧死後的集體領導，是由三個機構組成的。蘇共「中央委員會」規模最大，但權力最小。其代表集體領導地位的象徵乃是成員在職期間的穩定狀態。例如，幾乎所有一九二二年選出的委員，在一九二六年都能留任。其委員人數的增加（從二十七人增到五十三人），也符合列寧生前的願望。儘管如此，「共黨大會」未能提供「中委會」足夠的權力。同時，因為新委員受到提名的派系利益影響，故而失去其獨立的色彩。

另外一個參與集體領導的機構是「政治局」。從一九二二年到二六年，其人數維持七位，除了布哈寧（N. I. Bukharin）接替已故的列寧外，其餘人選未動。表面上，「政治局」因控制「中委會」而扮演決策角色。但實際上，其地位却為其內部的「三頭馬車」所掩蓋。

由於史達林個人權力的上升，「中委會」轄下「書記處」的重要性逐漸超過「政治局」和其中的「三頭馬車」小組。到了一九二六年，「書記處」已控制整個黨組織；至一九二八年，「書記處」成為史某決定國家政策的工具；至一九三〇年，史某已可利用「書記處」將所有異己逐出「政治局」<sup>③</sup>。

從派系的觀點看，列寧死時黨內出現四個不同的派系團體，每一個團體都有代表擔任「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史達林領導其中一個派系；托洛茨基為首的左派則包括著名的「革命領袖」，如拉迪克（Karl Radek）、皮阿塔可夫（Georgi Piatakov）等人；季諾維也夫和卡米涅夫領導一個以列寧格勒黨組織為班底的派系；第四個派系由下列「政治局」的三名「溫和派」成員所領導：布哈寧、李科夫（擔任列寧遺下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以及托姆斯基（蘇聯中央工會組織首腦）<sup>④</sup>。

上述黨組織和派系團體的權力分配固然缺乏穩定，但却提供史達林從事「聯盟戰略」（coalition strategy）的場合。史達

<sup>②</sup> Rush, "Brezhnev and the Succession Issue," *op. cit.*, pp. 9-10.

<sup>③</sup>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p. 31-32.

<sup>④</sup>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op. cit.*, p. 299.

林的這項戰略運用更和列寧死後留下的政策辯論，糾纏一起。

根據魯斯的看法，「列寧相信，蘇共政權的短程危機是領導階層的分裂；其長程危機是肇因於工人和農民階級之間的分歧。從長遠的觀點看，必須運用一套正確的政策才能化解這一危機。」<sup>⑤</sup>

涉及政策的分歧問題，由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Left opposition) 意見，認為沒有一個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卜正環境

②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p. 31-32.  
③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op. cit., p. 299.

林的這項戰略運用更和列寧死後留下的政策辯論，糾纏一起。

根據魯斯的眼光，「列寧相信，蘇共政權的短程危機是領導階層的分裂；其長程危機是肇因於工人和農民階級之間的分歧。從長遠的觀點看，必須運用一套正確的政策才能化解這一危機。」<sup>②</sup>

涉及政策的分歧問題，由托洛茨基領導的「左派反對」(Left opposition)意見，認為沒有一個共黨世界革命的外在環境，俄國的社會主義發展前途是十分黯淡的。因此，就這派而言，布爾什維克黨人應支持國外的革命運動，同時在國內追求一個急進的社會主義政策。托洛茨基反對「新經濟政策」(NEP)，主張加速工業化，必要時以農民為犧牲。他因此指控史達林對外採和「資產階級勢力」合作的立場，對內則不斷摧毀黨內「民主精神」；在這方面，季諾維也夫和卡米涅夫支持托氏的主張。「右派反對」(Right opposition)則由布哈寧為代表，他基本上同意左派的觀點，贊成俄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有賴於世界革命的完成。但這派人鑑於世界革命的前景暫非可待，認為蘇聯不應盲目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而應繼續現行的妥協策略，以及發展「新經濟政策」；史達林的意見則屬於「中間派」，認為儘管世界革命未能完成，但基於蘇聯廣大的幅員，衆多的人口和豐富的資源，社會主義仍有可能在蘇聯這樣的國家內建設<sup>③</sup>。

實際上，對史達林而言，政策的分歧只是提供其角逐最高權力的工具而已。我們發現，「左派」和「右派」的主張都具有持續性的特點；反之，史達林則是一個標準的機會主義者。誠如瑞沙諾夫斯基(Nicholas V. Riasanovsky)所說：「史達林和托洛茨基一樣，都是希望在俄國建立社會主義，他們也都以世界革命為目標。他們的基本信仰相同，只是意識形態的強調不同。」<sup>④</sup>

史達林一一消滅其政敵的過程，顯示出他玩弄權謀的技巧。史達林先是利用季諾維也夫和托洛茨基的歷史恩怨，再利用布哈寧等「右派」對「左派」政策的不滿，結合成一個廣泛的反托洛茨基同盟。因此，所謂「三頭馬車」小組，僅僅是利害關係的結合；史達林之支持「右派」政策也只代表史達林附合當時黨內多數意見的權宜之計。

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五年初這段期間，蘇聯國內的一片反「托洛茨基主義」(Trotskyism)聲浪；顯示出托洛茨基政治生涯的沒落。史達林的野心加上其政治勢力的高漲，引起卡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的戒懼。與其同時，史達林從一九二五年開始，進行摧毀這個非正式的「三頭馬車」的體制的計劃。史某利用「中委會」書記控制屬下的黨組織，首先奪取卡米涅夫在莫斯科的

②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p. 25-26.

③ Nicholas V. Riasanovsky, *A History of Russi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 543. See also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p. 25-30.

④ *Ibid.*



地盤，接着，在一九二六年初，從季諾維也夫手中奪得列寧格勒地區的黨組織。

史達林的攻勢迫使卡、季二人於一九二六年倒向托洛茨基，意圖對抗史達林和右派人士的聯合。「左派反對」人士的反撲於事無補。在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召開的第十五屆黨大會上，季諾維也夫和卡米涅夫爲了保存在黨內一席之地而悔改認「罪」；托洛茨基則面臨流亡國外的悲慘命運<sup>②</sup>。

當左派的勢力式微後，史達林轉而對付「右派反對」人士。「右派反對」團體對抗史達林的可用武器不多，這些人主要的權力基礎在政府，黨內力量則由史達林一手把持。魯斯教授認爲，右派人士可以採取兩種戰略：一種是求助於過去的「左派反對」人士；另外則是在黨內那些教條色彩較淡的黨員之間，以及反對史達林政策的廣泛社會團體中，找尋盟友。實際上，這兩種戰略都未奏效。「右派反對」人士很快地就在一九二八年至二九年期間，遭到挫敗。史達林利用其一手控制的「中央委員會」，將右派人士的黨內職務貶除，右派力量趨於解體<sup>③</sup>。

當一九三〇年「政治局」改選時，列寧時期的人馬只有一人留任。史達林權力的突出意味着列寧的繼承危機至此告一段落。

### 叁、史達林的繼承問題

史達林統治期間，爲蘇聯建立了一個極權主義的政治體系。根據富瑞德里赫（Carl Friedrich）和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說法，其主要的特徵是：一套官定的意識形態；由一個領袖領導的羣衆性政黨；秘密警察的恐怖；大眾傳播工具的受到嚴密控制；所有武器和軍隊的受到控制，以及集中控制和指導性的「統制經濟」<sup>④</sup>。

從權力的角度而言，絕對的追求「個人崇拜」應是史達林統治時期的最大特色。芬索德（Merle Fainsod）對此曾列舉史達林極權統治方式的一些信條：

- （1）以消滅那些實際的或潛在的競爭權力中心，來維護本身的安全；
- （2）以強調蘇聯制度的優越和領導人物的傑出的獨占宣傳，來滲透和麻醉蘇聯百姓的心靈；
- （3）以阻隔人民和外界之間，以及人民彼此之間的交往，來消除蘇聯百姓的其他選擇機會；
- （4）透過秘密警察，創造一個普遍不安全的環境。在此環境中，人們對於密告和勞工營的恐懼，一直存在着。<sup>⑤</sup>

<sup>②</sup>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p. 34-36; Tucker, *Stalin as Revolutionary*, op. cit., pp. 300-301.

<sup>③</sup>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p. 38-39.

<sup>④</sup> Carl J. Friedrich and Zbigniew Brzezinski,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and Autocrac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6), pp. 9-10.

<sup>⑤</sup> Fainsod, op. cit., p. 109.

總之，在史達林控制下，黨和秘密警察負責監視軍隊和行政機構的忠誠，與此同時，黨和秘密警察也彼此監視。在這樣一個充滿相互猜疑的制度下，史達林刻意製造各種機構的相互衝突。透過它們之間的權力分散，而把最高權力集在史達林個人手中<sup>②</sup>。因此，儘管史達林依賴黨官僚起家，但在他統治之下，黨的角色降低了，特務走到政治舞台前面。史達林於一九三六—三八，以及一九四〇年代末期對付異己的血腥整肅，誠然是今天蘇聯倖存黨政人員的一個夢魘。以最保守的估計，在一九三七—三八年期間，蘇聯境內大約百分之五的人口（總計約八百萬人），遭到秘密警察逮捕。其中約百分之十左右被槍決，其他人不是被送到勞工營，就是遭到放逐或是囚禁<sup>③</sup>。

史達林於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病逝，這位獨裁者死後不僅為蘇聯政權留下了權力轉移的問題，同時也為其繼承者留下了三個必須給與正視的，而曾被長期壓制的國內民衆的普遍「期望」問題：生活水準的改善；免於恐懼的安全感；更多的自由<sup>④</sup>。

### 一、馬林可夫的短暫領導

在安排繼承人這個問題上，史達林的態度是非常小心的。而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丹諾夫（Andrei Zhdanov）一度呼聲最高，被認為是繼承史達林的可能人選。但從一九四八年開始，日丹諾夫的勢力下降，而其主要對手馬林可夫（G. M. Malenkov）則乘機崛起。當時除了史達林外，馬林可夫是唯一脚踏「三條船」（「政治局」、「部長會議」和「書記處」）的人。當日丹諾夫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去世，以及緊接着在列寧格勒黨部對「日丹諾夫派」（Zhdanovites）展開的整肅運動後，馬林可夫權力大增，並因此引起史某的戒懼<sup>⑤</sup>。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史達林把赫魯曉夫從烏克蘭調到莫斯科，負責首都的黨務工作。史達林的本意並非要把赫某培養為未來的繼承人，而是為了平衡馬林可夫的勢力。這點和史本人生性多疑的作風有關。除此之外，史達林也採取下列兩項措施來加強其對政事之直接控制：一是重新安排黨的高層機構；另一則為策劃新的血腥整肅運動來鎮壓異己<sup>⑥</sup>。

由於史達林和他的前任一樣，「未能為一個高度個人化和集權化的獨裁體制提供一個有效的繼承；他的權力也未能依據法律

<sup>②</sup> *Ibid.*

<sup>③</sup> Mary McAuley,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7), p. 131.

<sup>④</sup> Fainsod, *op. cit.*, pp. 117-118.

<sup>⑤</sup>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 48.

<sup>⑥</sup> 史達林將「政治局」改名為「主席團」，將成員由原來的十名增為二十五名；「書記處」由四名增為十名。此外，一般認為，當時震驚蘇聯國內外的「醫生事件」(doctor-affair)是由史達林主使的，目標是打擊那些反對他的黨政領袖。*Ibid.*, pp. 48-51.

基礎而獲得制度化」<sup>⑤</sup>，因此，當史達林死的時候，蘇聯領導政治立刻出現兩項明顯的事實：「史達林過去同僚中，沒有一個人有足夠實力扮演史某的領導角色；其次，史達林的左右大都同意（至少是暫時的），有為國內外提供一個聯合陣線的必要。」<sup>⑥</sup>爲了防止混亂和不安，史達林死後不久，整個領導組織即重新改組。其目的不僅是減少黨政上層機構的規模，並且要提高其工作效率。新政府的領導階層是以馬林可夫、貝利亞（Larrenty Beria）和莫洛托夫（Vacheslav M. Molotov）組成的「三頭馬車」爲核心。

馬林可夫除了擔任部長會議主席外，並任蘇共中央書記處的總書記；貝利亞擔任內政部（MVD）部長，負責安全和內政事務（這兩項工作，過去分屬兩個單位主管）；莫洛托夫則擔任外交部長一職。

赫魯曉夫在新政府的地位非常特殊，雖然他不是「三頭馬車」的一員，但除了馬林可夫以外，他是「中央書記處」之中另一擁有中央委員會主席團委員頭銜的人。這項資格可以使赫某和「三頭馬車」小組維持政治關係。赫某在書記處的特殊地位，可以從蘇共中央的一項聯合決議中得見端倪。根據這項決議，「爲了使赫魯曉夫同志能集中全力作好其在蘇共中央委員會的工作，必須解除他擔任蘇共莫斯科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職位。」<sup>⑦</sup>更重要的是，赫魯曉夫運用蘇共「中央委員會」賦予他負責史達林葬禮事宜的機會。可以像史某過去在列寧葬禮中扮演的角色一樣，儼然以蘇共「馬前卒」的姿態出現<sup>⑧</sup>。

身兼黨政大權於一身，馬林可夫在史達林死後蘇聯領導階層的地位中，最爲突出。他在史達林葬禮中發表的演講，似乎像是蘇聯政策的代言人。在「書記處」的改組過程中，馬林可夫也安插了他多年以來，掌管黨幹事務的沙塔林（N. N. Shatalin），進入這個重要組織<sup>⑨</sup>。

馬林可夫似乎並不因爲他的突出地位而感滿足。在史達林死後幾天，各種跡象顯示馬某也嚮往史達林的絕對個人權力。例如，將近有一個星期的時間，蘇聯報紙力捧馬林可夫。這點令人想起當年蘇聯報紙對史達林的態度。其中包括「真理報」在三月十日，也就是史達林葬禮舉行的第二天，刊出的一張經過仿製的舊照片。在這張重新刊出的照片中，原來的合照者許多都消失了，爲的是刻意突出照片中馬林可夫的角色<sup>⑩</sup>。

事實證明，馬林可夫沒有史達林擁有的能力，無法利用其黨政職位，獲取至高無上的權力。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四日，馬林可

<sup>⑤</sup> W. W. Rostow, *The Dynamics of Soviet Society*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1967), p. 232.

<sup>⑥</sup> Fainsod, *op. cit.*, p. 119.

<sup>⑦</sup> *Pravda*, March 7, 1953. Quoted in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 57.

<sup>⑧</sup> Rostow, *op. cit.*, p. 233.

<sup>⑨</sup>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p. 551.

<sup>⑩</sup> 除馬林可夫外，新的照片中只保留原照（刊於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五日）裏面史達林和毛澤東二人。Ibid.

夫「要求」中央委員會「准許」他辭去總書記一職。他的「請求」當然照准，同時，「中央委員會」也沒有提出繼任人選。值得注意的是，「書記處」的成員已由十八減爲五人，而赫魯曉夫非名居首<sup>⑪</sup>。

<sup>23</sup> Rostow, *op. cit.*, p. 233.

<sup>24</sup> Leonard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0), p. 551.

<sup>25</sup> 除馬林可夫外，新的照片中只保留原照（刊於一九五〇年二月十五日）裏面史達林和毛澤東二人。 *Ibid.*

夫「要求」中央委員會「准許」他辭去總書記一職。他的「請求」當然照准，同時，「中央委員會」也沒有提出繼任人選。值得注意的是，「書記處」的成員已由十八減為五人，而赫魯曉夫排名居首<sup>23</sup>。

查皮若 (Leonard Schapiro) 教授認為，整個事件的經過皆費人猜疑。馬林可夫之要求解職，不知道是否因為受到其「書記處」同僚們的壓力而出此下策，或是馬某覺得他必須在黨政兩項職位中選擇其一。而就當時的環境看，馬某或許認為行政體系較黨組織更具影響力<sup>24</sup>。

總而言之，這次事件使得觀察蘇聯政治現象的人覺得，史達林死後的蘇聯政黨領袖，不再希望見到另一個史達林出現。而就繼承問題的角度看，馬林可夫的追求個人權力為期不過九天，他的失敗，使得史達林的繼承過程邁進魯斯分析架構的第二個階段，也就是所謂的不穩定的集體領導時期。

## 二、赫魯曉夫的奪權戰略和建立「極權式」獨裁

從馬林可夫、貝利亞和莫洛托夫的「三頭馬車」出現開始，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一項矛盾的組合，其權力分配不均，個人使用的戰略也不一樣。

莫洛托夫之所以成為「三人小組」的一員，並非因為他具有獨立的權力，也不是因為他已獲其他「兩頭馬車」的信任；而是因為「他享有老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聲望，曾擔任過去的政府領導職務，特別是，曾經為史達林多年的親信。」<sup>25</sup>

貝利亞的權力基礎是特務機關。擔任內政部長一職，使貝利亞可以安插他的親信到內政部所屬的各地區分支機構充當耳目。同時，貝利亞也積極整肅那些反對他的特工人員。貝氏最重要的戰略部署是爭取那些「民族幹部」(national cadres) 的支持，也就是分布於外高加索、波羅的海和中亞地區的少數民族。貝利亞認為，這些少數民族知識分子深富潛力，可以作為他爭取權力的政治資本<sup>26</sup>。

貝利亞勢力的高漲，為其政治前途帶來了危險。一九五三年七月十日，「真理報」首次透露了貝利亞被捕的消息，並指控他陰謀控制黨，故已成為人民的敵人。貝利亞受到的指控原因很多，有謂貝氏曾為英國情報單位工作了三十多年。但最重要的指控誠如私下流傳於蘇共「主席團」，提供高級黨幹參考的一項備忘錄所指出：「貝利亞企圖運用安全組織擴張本身權力。並且作為

<sup>26</sup> Rostow, *op. cit.*, pp. 233-234.

<sup>27</sup>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p. cit.*, p. 552.

<sup>28</sup>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 56.

<sup>29</sup> *Ibid.*, pp. 58-59.

對付『主席團』其他成員的工具。」赫某後來表示，黨「主席團」的所有委員早已感覺受到貝利亞的監視，並決定設計圈套來誘捕他。在這方面，平可夫斯基（Oleg Penkovsky）事後透露：

「我曾從瓦倫左夫（Varentsov）和朱拉也夫（Churavey）兩位元帥那裏聽到，貝利亞在莫斯科軍區總部建築地下室被殺的消息。貝利亞被克茲洛夫將軍（General Kozlov）當着其他將軍前射殺。貝利亞的屍體被澆上汽油後在地下室被焚化。」<sup>④</sup>

貝利亞的垮台，代表史達林以特務力量控制黨組織遂其個人統治時代的告一段落。從此刻起，特務又再度置於黨的直接指揮之下。另一方面，貝利亞的出局，也意味着史達林死後形成的「三頭馬車」，暫告解體。赫魯曉夫的勢力，則應運而生。

在追求權力的過程中，赫魯曉夫顯然從史達林那裏得到許多經驗。他所使用的謀略，可以說是史達林留下的再版。對赫某而言，一九五三年九月是他一生中的轉捩點。蘇共「中央委員會」正式任命他擔任「第一書記」。利用這個職位，赫魯曉夫很快就將自己的親信安插到重要的黨內機構，這些人只聽命於他，對於權力並無野心。爲什麼赫某會選擇黨組織作爲他奪取權力的戰略基地呢？魯斯教授有下列的描述：

「從一九二〇年代初期開始，他的政治生涯即在黨組織中渡過；在一九五八年首次進入政府部門並擔任首長職務之前，他從未在中央政府（部長會議）獲一席之地。此外，由於馬林可夫在三月中離開『書記處』，赫魯曉夫成爲該機構唯一的『主席團』（黨）成員，如此給與赫魯曉夫一個過去史達林在列寧死後第一階段繼承時期同樣的良機。因此，赫某註定要追隨史達林的足跡邁進。」<sup>⑤</sup>

儘管赫某當上了「第一書記」，但他並沒有立刻向馬林可夫權威挑戰的打算，以避免打草驚蛇。赫某希望等待機會，一舉將他的政敵置於死地。在這方面，政策的歧見問題提供了他奪權過程的主要內容。

史達林死後，蘇聯領導階層面臨的政策問題包括農業、工業和對外政策等。在赫魯曉夫和馬林可夫的對抗中，馬某在農業方面主張依賴專家、投資中部地區，以及密集耕作；赫某則贊成由農村黨組織負責農業管理，急速推行開墾處女地的計劃以增加農業生產；在工業方面，馬某主張以延後重工業的成長，來改善消費物品的供應，並且以減少國防支出的用費，來資助消費品的生產計劃；在外交政策方面，馬某認爲鑑於熱核武器戰爭的威脅，蘇聯應致力結束東、西冷戰；赫某則強調新武器的發展，增加了蘇聯受到突擊的危險，故應加強國防並積極從事冷戰<sup>⑥</sup>。

<sup>④</sup>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p. cit.*, p. 552. See also Oleg Penkovsky, *The Penkovsky Papers* (Garden City, 1965), p. 280. Quoted in Kozlov, *op. cit.*, p. 237.

<sup>⑤</sup>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 63.

<sup>⑥</sup> *Ibid.*, pp. 66-67.

馬林可夫的意見受到經濟部門及部長會議等行政官僚的支持，他們強調溫和的改革路線；而那些受到史達林提拔於一九二〇年代進入蘇聯政治舞台的人士，像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Lazar M. Kaganovich）等，則主張激進的冷戰政策。

② Schapiro, *The Communist Party*, op. cit., p. 552. See also Oleg Penkovsky, *The Penkovsky Papers* (Garden City, 1965), p. 280. Quoted in Rostow, op. cit., p. 231.  
③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 63.  
④ *Ibid.*, pp. 66-67.

馬林可夫的意見受到經濟部門及部長會議等行政官僚的支持，他們強調溫和的改革路線；而那些受到史達林提拔於一九二〇年代進入蘇聯政治舞台的人士，像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Lazar M. Kaganovich）、布加寧（Nikolai Bulganin）等則站在赫某這邊。這批人提心馬林可夫權力的坐大，在政策上則採較為保守的路線。

一九五五年二月八日，在「最高蘇維埃」舉行的一項兩院聯席會議中，由與會代表伏可夫（Volkov）宣讀一封馬林可夫的「辭職信」，辭去「部長會議」主席一職，而由布加寧取而代之<sup>②</sup>。

當馬林可夫遭到擊敗後，赫魯曉夫立刻修正他的政策主張。赫某認為他必須擺脫「史達林主義」維護者的形象。一九五六年蘇共第二十屆大會提供他表現形象的機會。赫某在二月十四日、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發表的兩篇演講中（後者為秘密演講），對於史達林的施政大加抨擊。綜合這兩篇演講，赫某的用意不外：①揭露史達林施政的種種錯誤過失，藉以打擊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心理；②揭露史達林對黨員的種種迫害罪行，藉以爭取黨員對新政府之同情；③藉貶抑史達林以緩和人民對政府之反感，進而爭取人民之合作；④藉貶抑史達林暗示蘇聯外交政策之新動向<sup>③</sup>。

史達林在講詞中提到的一些改革構想，實際上都是接近過去被他攻擊的馬林可夫路線；除此之外，大力貶史以及赫本人勢力的膨脹，都令史達林派分子感到戒懼和不满。一九五七年六月，赫某的政敵，包括馬林可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和史比諾夫（Shepilov）等，企圖在「主席團」中向赫的權力挑戰。根據平可夫斯基的「報告」，這些反對人士曾成功地免除了赫某「第一書記」的職位，僅給與農業部長的任命。赫某擔任此職務僅三天，透過他控制的「中央委員會」在莫斯科舉行的一項特別會議，以及在朱可夫元帥（Marshal Zhukov）等軍方的支持下，最後推翻了「主席團」的決定。上述反對赫某的共黨領袖，事後皆被冠上「反黨集團」（Anti-party Group）的罪名，分別被逐出黨政高層機構。一九五七年十月，赫某又運用他對付「反黨集團」的手法，以「維護黨的至高權威」為名，免除了朱可夫的國防部長一職<sup>④</sup>。

到了一九五七年時，所謂「集體領導」的形式已經瓦解。翌年三月二十七日，赫某再取代布加寧之部長會議主席地位，以一身兼任黨政兩方首長，進入其個人獨裁的時期，而結束了史達林死後的繼承危機。

在總結史達林死後的權力鬭爭時，林登（Carl A. Linden）教授有下列中肯的論斷：

「赫魯曉夫完全是一個從事真正權力鬭爭的政治機會主義者。歷史的發展方向自然令人想起這個念頭。赫某只是跟隨史達林的步履而已，先是擊敗一個對手，然後再接收他的政策。」

② *Ibid.*, p. 67 and Rostow, op. cit., p. 238.

③ 李邁先，*俄國史（上）*（臺北：正中書局，民國七十一年二月），頁七六〇—七六一。

④ Rostow, op. cit., p. 257.

「政治的需要偶然會促使赫魯曉夫扮演一個正統好戰者的角色；基於權宜之計，他也常常採中間立場；但他個人的信仰却更促使他在一個共黨政權中，趨向急進的改革路線。」<sup>53</sup>

### 肆、赫魯曉夫的繼承問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蘇共中央全會在一項特別會議中，由蘇斯洛夫（Mikhail Suslov）宣讀了赫魯曉夫的一連串「罪狀」。隨後，「中央委員會」即以赫某「年歲漸增，健康情況惡化」為名，接受了他的「辭呈」，免除其在黨政機構中的重要職位，包括「中委會」的「第一書記」、「中央主席團」成員和「部長會議主席」等職<sup>54</sup>。

這項克里姆林宮的不流血政變是由蘇共「主席團」和「書記處」的高級成員們所導演的。造成赫某被黜的原因很多，我們似可歸納下列三方面因素：

首先，赫某之集黨政大權於一身，令他的左右大員們感到戒懼。就在赫某被黜的前數月，他自奉為蘇聯武裝部隊的「最高統帥」，這項職位既使在史達林統治時代的平常時期，都無人擔任之。由於史達林的「大整肅」記憶猶新，以及赫某一九五七年以「反黨集團」為名對付異已的不良記錄，許多黨政領袖害怕赫某權力膨脹的結果，會使史達林式的個人獨裁重演，危及他們的既得權益<sup>55</sup>。

其次，赫某的作風得罪了蘇聯境內的許多勢力團體。例如，他對黨機構的改革，造成了那些帶有政治意識形態色彩的幹部們的疏離；他促使共黨在經濟管理中扮演關鍵角色，以及成功地重新打通對經濟活動的指導計劃，引起中央計劃者和政府經濟部門主管人員的不滿；他一再地干預蘇聯國防事務，也使軍方反對他的力量升高；他嚴厲抨擊史達林，使得那些致力維護黨機構的人，擔心他會控制不住而增加社會的不滿狀態<sup>56</sup>。

最後，在政策方面，赫某統治時期出現的國際共黨運動，東歐集團，特別是中蘇共的分裂，不但危及赫某人作為共黨領袖的聲望，同時也造成蘇聯權威的低落。此外，一九六二年的古巴飛彈危機，緊接着一九六三年的蘇聯農產歉收，都是赫某政績上的

<sup>53</sup> Linden, *op. cit.*, p. 23.

<sup>54</sup> Quoted in Joseph G. Whelan, "Soviet Succession from Lenin to Brezhnev: The Troubled Search for Legitimacy", *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hereafter cited as CRS), Report No. 82-152S, September 20, 1982, pp. 46-47.

<sup>55</sup> Rostow, *op. cit.*, 283-284.

<sup>56</sup> Linden, *op. cit.*, p. 208.

大污點。更嚴重的是，蘇聯經濟成長率的下降，使赫某的改革政策，變成了蘇聯人民眼中的「騙局」<sup>④</sup>。無論如何，赫魯曉夫的下台，意味着蘇聯另一個繼承時期又將展開。

### 一、初期的集體領導形式

赫某下台後，蘇聯的黨政大權由過去的集於一身，轉變成兩人分享。「第一書記」是布里茲涅夫，「部長會議主席」則由柯錫金（Alexei Kosygin）擔任。因此，涉及赫某留下的權力分配問題，這是一個明顯的集體領導形式，看不出任何一個人擁有獨占權力的跡象。和一九二〇年代、一九五〇代的繼承時期比較，赫某被黜以後，我們沒有看到隨即展開的所謂「左、右派」衝突、「反黨集團」鬭爭等派系傾軋的情況發生。霍夫（Jerry F. Hough）教授在歸納各家的說法之後，提出下列三種可能的解釋：第一，「政治局」的成員，至少是絕大多數人，不希望出現一個個人領導的現象，故未像過去那樣，在繼承時期的這個階段，發生權力鬭爭的情事；第二種解釋認為，儘管爭取個人獨占權力的鬭爭仍然在進行中，但布里茲涅夫沒有能力鞏固其地位，至少在一九七六年二十五屆蘇共大會之前，未能遂其所願；第三種解釋則強調，布某在赫魯曉夫倒台後，已在「政治局」中迅速扮演了控制的角色，但他決定不像其前任那樣地運用他的權力。布某基於要避免拔擢一些自認其未來可能會成爲繼承者的新人等理由，決意不排擠他的高級同僚<sup>⑤</sup>。

上述的解釋都可作爲參考。我們同意，那些陰謀罷黜赫某而發動「克宮政變」的黨政高級官員，皆希望維持蘇聯集體領導持續不墜的形象。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七日，「真理報」在赫某下台後三天，特別就這個問題，發表了重要的評論，評論中指出：

「黨的生活和工作，是由列寧擬具的一套原則和規範所決定的。這套原則和規範經過幾世紀的歷史經驗累積；已經過考驗，確定，並更爲充實。『集體領導』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個原則，一個經得起考驗的武器，是我們黨的一個最大政治遺產。只有透過『集體領導』的列寧主義原則，才能指導和發展黨和全體人民日益成長的創造動力……」

忠誠地遵守『集體領導』原則是符合列寧對於黨和工人羣衆所要求的首要 and 不可或缺的條件。<sup>⑥</sup>事實上，布里茲涅夫之所以未能在第一階段的繼承時期，爭取個人獨占性的權力，主要因爲他的對手實力不下於他，其中以包戈尼（A. V. Podgorny）最爲突出。

④ *Ibid.*, p. 206.

⑤ Jerry F. Hough,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56.

⑥ *Pravda*, October 17, 1964, p. 1.



根據魯斯的說法，由於赫某獲取其獨裁權力時已經六十三歲，他必須面對其繼承問題；事實上，赫某本人也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許多場合之中，他都曾提到日增的年齡，甚至死亡的問題，這是布爾什維克黨人所忌諱的一件事<sup>⑤</sup>。

由於赫某曾選擇季里成科 (A. I. Kirichenko) 作為黨的監督角色，季某一度被認為是赫中意的繼承人選。但從一九六〇年初開始，由政府部門調到黨「書記處」的柯茲洛夫 (F. R. Kozlov)，權力日增，很快地凌駕季里成科之上。在蘇共二十二屆大會新的「中央委員會」選舉出來的「書記處」中，柯某排名僅次於赫某，其他書記則按字母順序排列。這點顯示柯某可能成為未來的繼承人。但從一九六一年開始，柯茲洛夫的健康情況即發生問題。一九六三年六月，當時擔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的布里茲涅夫，再度回到「中委會」「書記處」。布某即取代了柯茲洛夫的角色，成為最有可能的繼承人選<sup>⑥</sup>。

蘇共中央全會決定讓布里茲涅夫進入「書記處」的同時，也將包戈尼從烏克蘭地方黨部，選進「書記處」。這種安排和過去史達林把赫魯曉夫弄到「書記處」以對抗馬林可夫的情況，幾乎雷同。赫魯曉夫的戰略顯然是要以包戈尼來平衡布里茲涅夫的勢力，藉以鞏固本身的獨裁權力。

包戈尼的主要經歷是監督卡爾可夫 (Kharkov) 和烏克蘭地區的輕重工業設施，但一九六四年十月以後，他在中央「書記處」的角色，似乎是負責黨組織的工作。此外，包戈尼在卡爾可夫工作時的助手狄托夫 (V. N. Titov)，則擔任負責黨組織工作的中委會「書記」職位；「烏克蘭中委會」第二書記（負責該地人事的選拔），也來自卡爾可夫黨組織的人士擔任。因此，如果負責選擇次級黨書記的角色，是建立權力基礎的關鍵位置，則包戈尼似乎是權力在握。至少，包戈尼在一九六四年年底時，有足夠資格向布某的權勢挑戰<sup>⑦</sup>。

因此，布里茲涅夫在赫某被黜初期，其地位並不像其前任進行奪權鬭爭時那樣，屬於「書記處」中的唯一「政治局」委員。布某一開始就面對了「書記處」中四名「政治局」委員的挑戰，此即蘇斯洛夫、季里年科 (A. P. Kirilenko)、包戈尼和謝里賓 (A. N. Shepin)。其中一些主要對手曾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中採聯合陣線。以免布里茲涅夫會運用他的「第一書記」職權來為所欲為<sup>⑧</sup>。

## 二、布里茲涅夫的奪權戰略和建立「小型」獨裁

<sup>⑤</sup> Rush, *Political Succession in the USSR*, op. cit., p. 133, 116.

<sup>⑥</sup> *Ibid.*, pp. 134-137.

<sup>⑦</sup> Hough, op. cit., 256-257.

<sup>⑧</sup> Rush, "Brezhnev and the Succession Issue", op. cit., p. 11.

儘管表面上維持集體領導的形式，但布里茲涅夫從一九六五年春天開始，即着手爭取個人的權力計劃。西方觀察家已發現，

① Hough, *op. cit.*, 256-257.

② Rush, "Brezhnev and the Succession Issue", *op. cit.*, p. 11.

儘管表面上維持集體領導的形式，但布里茲涅夫從一九六五年春天開始，即着手爭取個人的權力計劃。西方觀察家已發現，對布某有利的權力平衡改變，其過程是「漸進而幾乎是淡淡的。」<sup>①</sup>

布某的奪權戰略，幾乎和其前任使用的方法，如出一轍。其戰略包括：(1)運用其黨書記的職務，在「中委會」「書記處」獲得優勢地位；(2)運用「書記處」以控制全國的黨組織；(3)運用黨組織控制其他政治機構。此外，以安插親信整肅異己來重組「中委會」和「政治局」，達到控制這兩個決策機構的目的<sup>②</sup>。

根據上述的戰略，布某首先向包戈尼的親信狄托夫開刀。一九六五年四月，狄托夫從中央「書記處」被調到哈薩克共和國擔任「第二書記」職務。不到三個月，蘇共中央在一項決議中暗示其在地區黨部工作不力，此一決議具有政治上的意義；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包戈尼被迫離開中央「書記處」的重要職位，以取代退休的米高揚，擔任有名無實的「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儘管包戈尼和他過去在卡爾可夫的助手仍居高位，並維持黨中央委員的身分，但他們已失去主管人事的權力。與此同時，布里茲涅夫的另一政敵謝里賓也遭貶抑。一九六七年七月，謝里賓被調離中央「政治局」，但任「全聯盟中央工會會議」(All-Union Central Trade Union Council)主席，這個職位代表他政治前途已告黯淡。過去在「共青團」和謝里賓共事的同僚和親信，也一一遭到波及，離開了重要的職位<sup>③</sup>。

當包戈尼和謝里賓的政治力量削弱後，布里茲涅夫的權力相對地增加。明顯的證據是，過去他在「德涅普若皮托夫斯克」(Dnepropetrovsk)和莫達維亞(Moldavia)的部屬，都一一竄升，盤據許多重要的職位。例如，布某的親信之一，斯契洛科夫(N. A. Shchelokov)即於一九六六年九月擔任蘇聯「公共秩序維護部」(後更名為內政部)部長之職；布某過去的三個老部屬，也分別於一九六七至七〇年期間，據任「國安會」(KGB)「副主席」職位；布某在德涅普若皮托夫斯克時的一個鋼鐵工廠主管吉浩諾夫(N. A. Tikhonov)在一九六五年被任命為「部長會議」「副主席」，並在一九七六年夏天升為「第一副主席」。<sup>④</sup>

一九六六年，布某將黨「第一書記」恢復為「總書記」名稱，這是史達林一九二八至三七年期間從事個人統治使用的頭銜。從一九六〇年代末期開始，布某已穩定的走向個人獨裁之路。他在「政治局」的排名第一，其他成員則按字母順序排列。他的姓名和照片不斷出現在大眾傳播媒介上。儘管布某位居共黨首腦，但在處理對外事務，特別是出席國際會議時，儼然以蘇聯的代表

③ Whelan, *op. cit.*, p. 50.

④ Rush, "Brezhnev and the Succession Issue", *op. cit.*, p. 11.

⑤ Hough, *op. cit.*, pp. 257-258.

⑥ 其他重要的人事變動見 *Ibid.*, pp. 258-259.

自居，而視國家元首包戈尼，和政府元首柯錫金於無物。

到了一九七六年的時候，布某已被他的支持者稱為「一個不屈不撓的和平鬥士和真正的社會正義」，「一個為和平和共產主義奮鬥的傑出鬥士。」一些蘇共中央委員宣稱：「所有的成就，無論是內政或外交，都永遠和他的名字連結一起。」在蘇共二十五屆大會上，一名「政治局」委員稱布某是「蘇聯共黨普遍接受的領袖」。另一名「政治局」候補委員則稱他為「當代最傑出和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sup>⑤</sup>

到了七〇年代末期，由於謝里賓和波良斯基（Polianski）之先後被逐出「政治局」，一九七七年包戈尼的下臺由布某取代其國家元首職位，加上布某之自封元帥及擔任「國防會議」（Defense Council）主席等事實，代表布里茲涅夫已成功地完成個人權力的追求。當柯錫金於一九八〇年代去職而由布的親信吉浩諾夫繼任「部長會議主席」後，布里茲涅夫實際上已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此時，不但「集體領導」大為變質，布某和其前任一樣，也建立了另一個「個人崇拜」的形態。<sup>⑥</sup>

## 伍、布里茲涅夫的繼承問題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十日，布里茲涅夫病逝，兩天之後，安德洛波夫（Y. V. Andropov）繼任蘇共「總書記」的職位。和過去的繼承比較，這次的權力轉移時期沒有發生明顯的黨內鬭爭情況。主要原因是布某晚年纏綿病榻時，蘇聯的權力鬭爭即已展開，故繼承問題在布某死前就已經發生了。畢亞勒教授表示，布某去世前兩三年，即已步入半退休狀態。他僅能斷斷續續地工作，每天工作僅數小時。大多數觀察家認為，在一九八二年夏天之前，布某已無法指導黨政日行事務，到了八二年夏末，他甚至只有遙控的能力。<sup>⑦</sup>

### 一、安德洛波夫的脫穎而出

<sup>⑤</sup> *Ibid.*, pp. 259-260.

<sup>⑥</sup> *Ibid.*, p. 260. See also Bialer, *op. cit.*, p. 73 畢亞勒形容布某的「個人崇拜」為「迷你型的個人崇拜」（mini-cult of personality）：此外，有關「國防會議」這個機構，它在一九七三年以後才為世人所知。透過我們對二次世界大戰時蘇聯類似組織「國防委員會」（The State Committee of Defense-GKO）的了解，「國防會議」可能是蘇聯最高的軍政決策單位。其組成分子廣及蘇聯軍方、特務機構、國防工業，以及共黨官僚體系的主管。其決策事項除軍事外，還包括社會、經濟、外交等層面。

<sup>⑦</sup> Seweryn Bialer,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Robert F. Byrnes, ed., *After Brezhnev,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in the 1980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8. 蘇聯報紙曾刊出涉及布某家族醜聞的消息，暗示其影響力的式微：蘇聯電視出現布某參加其朋友葬禮的痛哭畫面，影射了布某的身體狀況無法控制激動的情緒。Whelan, *op. cit.*, pp. 78-79.

當柯錫金退休與去世後，布里茲涅夫的繼承問題即出現在蘇聯政治舞臺上。共黨理論家蘇斯洛夫本來被認為是布某的推定繼

② Seweryn Biater,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Robert F. Byrnes, ed., *After Brezhnev,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in the 1980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 18. 蘇聯報紙曾刊出涉及布某家族醜聞的消息，暗示其影響力的式微；蘇聯電視出現布某參加其朋友葬禮的痛哭畫面，影射了布某的身體狀況無法控制激動的情緒。W. Bielan, *op. cit.*, p. 28-29. 據說，布某對個人與對黨均持懷疑態度。西式新黨派已出現。

當柯錫金退休與去世後，布里茲涅夫的繼承問題即出現在蘇聯政治舞臺上。共黨理論家蘇斯洛夫本來被認為是布某的推定繼承人 (The heir presumptive)。一九八二年一月二十五日，蘇某病逝，他的影響力隨即煙消雲散。明顯的證據是蘇某一手支持的工會領袖斯巴耶夫 (Alexsei I. Sibayev) 在他死後不到一星期，即被免除其「全聯盟中央工會會議」主席的職位。<sup>②</sup>

根據西方研究蘇聯問題學者的看法，蘇斯洛夫死後，布里茲涅夫的可能繼承人選包括下列諸人：

① 契爾年科 (Konstantin Chernenko)：自從一九七六年以後，他即在中央「書記處」內負重要責任。身任中央「總務部」 (General Department) 的首長，他管理「書記處」及中央各部組織人事，一般書信公文等事項。一九七七年十月，契某獲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一九七八年十一月，成為正式委員。一九八二年三月，他主持工會領導階層的變動，隨後即被視為代理「總書記」的角色，涉及軍事、警察、農業及外交事務。

② 安德洛波夫：他的主要經歷是一九六七到一九八二年五月期間，擔任「國安會」首腦的職位。當安某被任命為中央書記時，可能也擔負了某種政策上的責任。

③ 季里年科：中央書記，負責工業管理和共黨集團的經濟關係。季某長期以來即被認為是布里茲涅夫的可能繼承人。一九八二年初，季某曾神秘失踪了四個月，直到五月時才出現。

④ 烏斯蒂諾夫 (Dmitriy Ustinov)：被認為是調和黨、政、軍各方利益衝突時的最佳人選。烏斯蒂諾夫是軍事工業專家，從一九六五年到七六年期間，即在中央「書記處」工作。一九七六年四月開始被任命為國防部長，其影響力不容忽視。

就長遠的觀點看，其他列入考慮的候選人，包括下列四名「政治局」委員：格里辛 (V. V. Grishin)，莫斯科市黨委會第一書記；戈爾巴契夫 (Mikhail Gorbachev)，在書記處負責農業部門的工作；羅曼諾夫 (Grigoriy Romanov) 列寧格勒省黨委會第一書記；謝爾必茨基 (V. V. Shcherbitskiy)，烏克蘭共和國黨第一書記。加上兩名「政治局」候補委員，俄羅斯共和國部長會議主席的索洛敏澤夫 (M. S. Solomentsev) 和在中央「書記處」負責重工業部的道爾吉赫 (V. I. Dolgikh)。<sup>③</sup>

在所有上述的人選中，契爾年科最被看好。我們大膽假定，如果布里茲涅夫有較長的當政時間，契某可能有較多的機會成為他的繼任人。但和過去的幾次繼承時期一樣，布里茲涅夫顯然無力使他的推定繼承人，坐上克里姆林宮的寶座。而最大的諷刺是，安德洛波夫之獲選為黨「總書記」和「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却是由他的對手契爾年科提名的。

安德洛波夫是蘇聯歷史上，第一個沒有長期黨組織工作經驗而獲選為蘇共領袖的人。安某的王牌是他具有一個堅強領導人的

②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March 8, 1982, p. 6; *The New York Times*, March 6, 1982, p. 4.

③ Sidney I. Ploss, "Soviet Succession: Signs of Struggle,"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1, September-October, 1982, pp. 45-50; Jerry F. Hough, "Soviet Succession: Issues and Personalities,"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1, September-October, 1982, pp. 28-37.

聲望，同時被認為是一個通才。畢亞勒認為，支持安某的一羣人可能包括「政治局」的元老（特別是烏斯蒂諾夫），加上「書記處」的年青成員。前者之所以支持他，主要因為他們深感本身無望爬上克宮寶座之餘，覺得像安德洛波夫這樣有自己顯著不同經歷，而又屬於他們這一代的人，當上領袖最好不過。至少比契爾年科這樣畢生追隨布里茲涅夫的人，好得多；後者之支持安某，則因安某不會像契爾那樣只會繼續布某的政策。這批年青的書記一方面具求變心態，另一方面希望元老派當中年齡較輕者，能出現一個強有力的領袖。安德洛波夫正好符合這些資格。<sup>②</sup>

另一方面，霍夫教授從政策的角度觀察，安德洛波夫有多年處理東歐事務的經驗，特別是涉及波蘭團結工聯的棘手問題。有關經濟問題安某表現出改革者的傾向，且他在「國安會」的記錄，不但可以為其他蘇共領袖提供改革運動不致脫離軌道的保證，並且也可顯示他對內政事務的熟悉。此外，對那些少壯派領袖而言，由於安某健康情況的惡劣，他必將屬於短命的領袖，這點使他們可以安心。<sup>③</sup>

## 二、過渡領導的角色

安德洛波夫在衆多競爭中脫穎而出，並不表示克宮領導階層的權力鬭爭就此結束。根據長期觀察莫斯科政情發展的蘇聯問題專家塔圖（Michel Tatu）的說法，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當布里茲涅夫病逝後不久，莫斯科的政治氣候即沉悶異常，包括布某餘黨和保守的黨幹們組成的「契爾年科幫」，陰謀集中全力使安德洛波夫無法獲得「政治局」中他所需要的多數同意。安某最後雖然擊敗了他的政敵，但塔圖認為安某只是以些微多數獲得任命為「總書記」。因此，塔圖預測未來數月安的統治仍將受到契爾年科勢力的影響。而這種政治上的僵局，可能會在最近的未來，達到最高點。<sup>④</sup>

不可否認地，安德洛波夫入主克宮後，很快地像他的前任一樣，獲得「國防會議」主席的頭銜，並且也當選了蘇聯的國家元首；另一方面，安某也透過人事的調動，使他的親信進入重要的黨政機構，並且排除了若干布里茲涅夫留下的黨羽。最具體的例子是，契布里科夫（V. M. Chebrikov）被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李珈契夫（Y. K. Ligachev）被選為中央書記，伏羅特涅可夫（V. I. Vorotnikov）和索洛敏澤夫兩個重要親信，由候補委員，升為「政治局」正式委員。此外，安某也在部長會議各部長以及蘇共中央各部更動人事。至一九八三年底，「部長會議」以下，至少有十名部會首長及十六名大使被撤換。」其中，以

<sup>②</sup> Bialer,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Byrnes, *op. cit.*, p. 42.

<sup>③</sup> Jerry F. Hough, "Andropov's First Yea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2, November-December 1983, p. 56.

<sup>④</sup> Michel Tatu, "Andropov's Difficulties," part 1, *Le Monde*, April 19, 1983. Quoted in Joseph G. Whelan, "Andropov and Reagan As Negotiators: Contexts and Styles in Contrast," CRS, Report No. 83-1415, June 30, 1983, pp. 48-49.

繼任「國安會」主席不久的費道楚爾克（V. Fedochurk）接任被撤職的內政部長，最引人注目。<sup>⑤</sup>

諸音如此，我們並不認為安德洛波夫已成功地建立了他的個人統治。安某惡劣的健康狀況，註定使他扮演「過渡領導」（

② Bialer,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Byrnes, *op. cit.*, p. 42.

③ Jerry F. Hough, "Andropov's First Year," *Problems of Communism*, Vol. 32, November-December 1983, p. 56.

④ Michel Tatu, "Andropov's Difficulties," part 1, *Le Monde*, April 19, 1983. Quoted in Joseph G. Whelan, "Andropov and Reagan As Negotiators: Contexts and Styles in Contrast," CRS, Report No. 83-1415, June 30, 1983, pp. 48-49.

繼任「國安會」主席不久的費道楚爾克(V. Fedochurk)接任被撤職的內政部長，最引人注目。」<sup>⑥</sup>

儘管如此，我們並不認為安德洛波夫已成功地建立了他的個人統治。安某惡劣的健康狀況，註定使他扮演「過渡領導」(transition leader)的角色；他的改革措施停滯不前，導致反抗，也使他無力從事權力「合法化」的工作。

安某就任黨領袖時已經六十八歲，較其任何前任掌權時都顯得老邁。事實上，早在安某入主克宮之前，他的健康情形就不很好。關於他的病情揣測很多，其中包括一九六六年的一次心臟病發作。也有報導說他患的是需要洗腎的慢性腎臟炎，以及糖尿病等。自從他接替布里茲涅夫後，他曾多次住院療養。當他再度出現公共場合時，他的面容顯得蒼白而疲勞，行坐需人攙扶。<sup>⑦</sup>一九八三年六月，當芬蘭總統柯衣維斯托(Mauno Koivisto)訪問莫斯科，參加一項晚宴時，安某需人扶助入座。七月，當他接待來訪的西德總理柯爾(Helmut Kohl)時，右手即不住顫抖。最後，在去年八月十八日，安某接待一個美國參議員訪問團後，即未曾在公開場合露面，特別是未曾參加十一月及十二月的一系列重要集會，包括十一月七日的紅場閱兵和十二月舉行的蘇共中央委員會會議和最高蘇維埃會議。<sup>⑧</sup>

蘇聯官方對安某的長期不露面，曾作了兩次正式說明。去年十月三十日，安某在答覆第三屆「國際防止核子戰爭」醫師代表大會呼籲書的公開信中說，他因「感冒」未能與大會代表們晤面而感遺憾。十二月二十七日則表示因「臨時原因」不能出席蘇共中央全會。<sup>⑨</sup>

蘇聯似乎有意掩飾安某嚴重的病情，威連(Joseph G. Whelan)教授認為，在共黨國家，

「個人的健康情況是不容忽視的，它是統治者生命和效能的關鍵因素。明顯的健康欠佳，會促使競爭者角逐權勢。因為他們預期統治者無能為力或是即將下臺，並且不願意順序追隨一個患病的領袖。就這方面而言，似乎是安德洛夫的一大弱點。」<sup>⑩</sup>

此外，安德洛波夫「經濟改革」計劃之無法徹底付諸實施，除了歸咎於制度的包袱之外，安某之缺乏穩固的權力基礎也是重要因素。由於領導階層的搖擺不定，任何人都不願採取主動創新，在執行上級決策時，也抱着猶豫不決的態度，因為沒有人知道

⑥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27, 1983, p. 1, 32: 畢英賢，「安德洛波夫的健康、權力與政績」，問題與研究，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十日，頁四六。

⑦ Whelan "Andropov and Reagan," *op. cit.*, pp. 35-36.

⑧ *Time*, February 20, 1984, p. 21.

⑨ 前引畢英賢「安德洛波夫的健康」，頁四四。

⑩ Whelan, "Andropov and Reagan," *op. cit.*, p. 52.

，安某下一刻還會不會安穩地坐在克宮的權椅上。許多人認為，蘇聯對於韓航客機被擊事件的反應，暴露了安德洛波夫政權處理緊急變故的無能，而任由軍方來應付善後的問題。<sup>⑧</sup>

## 陸、安德洛波夫的繼承問題

安德洛波夫於今年二月九日去世。他的死為蘇聯留下許多尚未或尚待解決的問題。安某所作為蘇聯經濟生活注入「秩序」和「紀律」兩項因素的承諾，仍未兌現；生產成長率經過一度回升後，又告停滯不前；蘇聯和美國的關係，由於莫斯科之退出多項裁軍和武器管制談判，而陷入了嚴重的低潮。最重要的是，就在安某死前，蘇聯官方還在散布「語意學」的煙幕，企圖玩弄障眼法來欺騙世人。例如，在安某死前兩個星期，一名克里姆林宮的發言人即向莫斯科的外國記者們「保證」，安某的病體已在康復之中，不久即會再度露面。<sup>⑨</sup>

契爾年科之獲選為繼承人，是在安某死後四天，也就是今年二月十三日為蘇聯官方宣佈的。在這段期間，敵對派系之間可能會為新領袖的產生，從事協調的工作。因此，我們見到的權力轉移過程仍相當穩定和平靜。鑑於安某有半年多的時間臥病在床，我們有理由相信，權力鬭爭的暗潮早在去年底就已展開。至安某死時，有關繼承人選的問題，已經蓋棺論定了。

### 一、權力角逐者的代溝問題

預測安德洛波夫的繼承人選相當困難，誠如魯斯教授所說：「由於沒有一個人能居於強勢地位，於是變成每一個人實際上都處於強勢地位的狀態。」<sup>⑩</sup>

魯斯言下之意，所有的權力競爭者都認為自己擁有相當實力，至少是一場難分難解的局面。這點我們就可以就派系的觀點找到例證。在「政治局」的成員中，屬於契爾年科這一派的有吉浩諾夫，索洛敏澤夫兩個布里茲涅夫的餘黨，以及隨後加入陣容的格里辛、謝爾比茨基和庫納耶夫（D.A. Kunayev）；屬於安德洛波夫派的有葛羅米柯，烏斯蒂諾夫兩位老人，再加上安某生前提拔的四位新人：戈爾巴契夫、羅曼諾夫，阿里耶夫和伏羅特涅可夫。<sup>⑪</sup>在權力分配上，這是六一六對局的態勢。

<sup>⑧</sup>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November 18, 1983, p. 23.

<sup>⑨</sup>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21, 1984, p. 48.

<sup>⑩</sup> *Time*, February 20, 1984, p. 14.

<sup>⑪</sup> *Newsweek*, February 20, 1984, p. 11.

- ②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21, 1984, p. 48.  
③ *Time*, February 20, 1984, p. 14.  
④ *Newsweek*, February 20, 1984, p. 11.

在上述這些人當中，如果以年齡來區分，最有可能擔任「總書記」的是屬於元老派的契爾年科（七十二歲）、烏斯蒂諾夫（七十五歲）、和葛羅米柯（七十四歲）三人，以及年青的羅曼諾夫（六十一歲）和戈爾巴契夫（五十二歲）兩人。<sup>④</sup>由於「政治局」成員的平均年齡高達六十七歲，因此，如果選擇元老派作為繼承人，則將冒另一個短命政權的危險；如果選擇年青人的話，則這些人因在權力中心缺乏代表性，能否有效運用其權力，也令人感到懷疑。

在從事揣測的過程中，上述兩名年青人的行情最被看好。例如，頗享盛名的霍夫教授即給與戈爾巴契夫百分之九十的獲選機會，予羅曼諾夫百分之八的機會，以及其他他人百分之二機會。霍夫之所以中意戈爾巴契夫，主要因為：第一，他在「中委會」中，是一名負責組織工作的書記，同時是「國防會議」的成員。他的年齡適中，經驗也夠。從一九八三年底開始，他就為其權力基礎的建立，作了鋪路工作；第二，他是「政治局」中學歷最好的一位，莫斯科大學的畢業生；第三，他是負責農業問題的專家，農業政策的擬定在蘇聯特別重要；第四，從加拿大之行回國後，許多跡象顯示，戈爾巴契夫的地位已蒸蒸日上。<sup>⑤</sup>

霍夫雖然沒有給與羅曼諾夫較多的「機會」，但許多西方觀察家仍舊認為他的可能性很高。一九八三年六月，羅曼諾夫從列寧格勒來到莫斯科並擔任蘇共中央書記後，他的角色大為突出。羅曼諾夫是一名造船專家，以傲慢好鬪而出名。他的這些個性，很合乎保守的黨政官僚胃口。

無論如何，契爾年科捲土重來的潛力，被多數西方觀察家所忽略了。誠然，對西方人士而言，契爾年科有其不利的地方，譬如說，作為一個龐大蘇聯帝國的統治者，他的年齡較其對手為大；長期處於布里茲涅夫的陰影下，使他無法建立自己的權力基礎；同時，他也缺乏實際的經驗和處理經濟事務的素養。但是，造成外界對這次蘇聯繼承問題錯估的主要原因，可能就像「基督教科學箴言報」駐莫斯科的記者柴切爾（Gary Thatcher）所說：第一、西方應用自己的價值和邏輯觀念去解釋非西方社會所造成的錯誤；第二，缺乏有關克宮領導階層的可靠資料；第三，蘇聯仍舊以固執的態度，秘密地處理它的事務<sup>⑥</sup>。

## 二、利益衝突的調和者

契爾年科的上臺，確實令外界感到驚奇，但莫斯科街頭的人們，則抱處之泰然的態度。對大多數蘇聯人民而言，政治無力而產生的疏離感，已成為普遍的心態。曾經派駐在莫斯科一段時期的蘇聯問題專家凱瑟（Robert G. Kaiser）形容這是蘇聯統治

- ⑤ *Time*, February 20, 1984, pp. 14-15.  
⑥ Hough, "Andropov's First Year," *op. cit.*, pp. 60-62.  
⑦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21, 1984, p. 48.



者和老百姓之間的一種「歷史性的討價還價」(the historic bargain)。換言之，「老百姓(不得不)放棄他們選擇領袖和影響政策的權力，來換取基本的安全、秩序和日常生活的必需品。」<sup>⑭</sup>實際上，除了老百姓之外，蘇聯的黨政精英之中，也有「安全感」的需求。這些人多數是在一九二四—五二年期間獲取權力的，他們逃過史達林大整肅的浩劫，對於任何政治變動皆存有濃厚的恐懼感。契爾年科可能就在這種需求下敗部復活的。

在諸多權力角逐者之中，年青的候選人顯然未能獲得足夠的支持。因此，為了避免破壞性的權力鬭爭，唯一的辦法是選擇一個過渡領袖來維持大局，並希望藉此讓那些競爭者調和其利害衝突。<sup>⑮</sup>至於為甚麼不選擇其他元老派而偏偏看中契爾年科，主要原因可能是契爾年科以「政治局」委員而兼「書記處」書記之故。除此之外，契爾年科擁有下列的「政治資產」：第一，儘管他沒有實際的經驗，但擔任布某長期的助手，他至少曉得作為一個領袖必須面對的內外議題是甚麼；第二，擔負了多年的「中委會」「總務部」責任，他有機會透過黨組織來影響人事調動；第三，安德洛波夫上臺後，契爾年科被調到主管意識形態的部門，這是一個頗孚衆望的職位；第四，在安某當政期間，他常常主持「政治局」會議；安某臥病後，契爾年科可能代替他處理日常事務。<sup>⑯</sup>

事實證明，契爾年科是一個老謀深算的共黨政客。儘管在第一回合的權力鬭爭中敗北，但他並沒有放棄其權力的野心，面對他的政敵坐上克宮寶座，契爾年科的行動像是一個「好戰士」，避免讓人覺得他是一個伺機而動的有力候選人。<sup>⑰</sup>

安德洛波夫的多病，提供契爾年科很好的機會。一九八三年六月十四日，契爾年科在蘇共中央全會發表了一篇重要的意識形態演說。十六日，契爾年科提名安某為「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顯示其地位的不尋常。十一月，他代替重病的安某主持紅場閱兵。除了去年三、四月和七、八月生病而未在公眾場合出現外，契爾年科運用其主管共黨理論的地位，曾接見許多外國的代表團。從去年年底開始，契爾年科也發表多篇文章，儼然以「馬列主義權威」的姿態出現。其言論集的再版，在安德洛波夫死前不久即開始發行。至安某病故，契爾年科被選為治喪委員會主任委員後，其行情大為看漲。總括他在安某患病期間的角色，「新聞周刊」轉述華府蘇聯高級外交官的話說：「契爾年科擔任安某和政治局之間的橋樑，他來往於克里姆林宮和安某養病之處，儼然就是蘇聯的行政長官。」<sup>⑱</sup>

契爾年科的年齡加上其多次患病的記錄，顯示出新的權力鬭爭可能隨着契爾年科的上臺而展開。在契爾年科可能的繼承人之中，

<sup>⑭</sup> Mary Costello, ed., "Russia Under Andropov," *Editorial Research Reports*, Vol. 1, No. 1, January 7, 1983, p. 20.

<sup>⑮</sup>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5, 1984, p. 14.

<sup>⑯</sup> *Soviet World Outlook*, Vol. 9, No. 2, February 15, 1984, p. 2.

<sup>⑰</sup>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5, 1984, p. 14.

<sup>⑱</sup> *Newsweek*, February 20, 1984, p. 11.

戈爾巴契夫的希望最大，在為安某送葬的照片中，戈爾巴契夫出現在契爾年科的右手邊，顯示其地位之不凡。誠如前述，推斷蘇聯領袖的更

戈爾巴契夫的希望最大，在為安某送葬的照片中，戈某出現在契某的右手邊，顯示其地位之不凡。誠如前述，推斷蘇聯領袖的更迭相當複雜。但擁有下列資格的人士，其繼任的可能性較其他人為大。①繼承人必須是「政治局」的正式或候補委員，而在「書記處」擔負重要責任者；②俄羅斯人或俄化的斯拉夫人可能居大；③除非屬於「過渡領袖」，否則年齡不應超過七十歲；④成功的競爭者可能是繼承期間採「中間路線」，並有妥協性格的領袖。<sup>⑤</sup>

## 柒、結 論

自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以後，若干西方學者對於極權主義模式的應用價值表示懷疑，他們認為史達林死後，蘇聯的政治環境已出現明顯的改變，甚至有西方多元社會的傾向。但針對本文研究的結果，筆者認為，以極權主義政治體系來形容今天的蘇聯，仍舊有相當的正確性。至於那些假定蘇聯已趨向多元政治的說法，筆者認為純屬神話。

我們試從哈姆斯東 (Teresa Rakowska-Harnstone) 在探討蘇聯領導階層維持問題所作的分析架構，用來總結本文的研究結果。哈姆斯東認為蘇聯政治體系包含三個重要因素：(1) 經由共黨在蘇聯社會的領導角色，實施權力的壟斷；(2) 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提供蘇聯合法性的意識形態來源；(3) 缺乏任何政治的繼承規定。上述三項特點，加上政治上解決問題和消除衝突的需求，使蘇聯政治領袖或領導團體，必須具備下列要件才能有效地運用其權力：(1) 個人和整個體系的合法性；(2) 控制權力機構；(3) 成功的決策。<sup>⑥</sup>

從上述的分析架構，我們發現蘇聯領導人物所必備的要件，皆和權力有密切關係。為了獲取合法性，領導階層的鬭爭，代替了憲政的權力轉移。有些西方學者認為，赫魯曉夫的權力轉移，創造了一個與過去不同的形態。認為布里茲涅夫的接棒，並沒有在集體領導中造成明顯的權力鬭爭，故以「繼承危機」來形容過渡時期有欠妥當。此一說法，不能令人完全信服。表面上看，赫某下臺時，確未發生過去那樣的流血整肅，但沒有流血不表示沒有鬭爭。克里姆林宮的權力鬭爭內幕本就不足外人道，何況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許多權力鬭爭早在共黨獨裁者被黜、去世或退休前就已展開了。

其次，控制權力機構，必須依賴高於此機構權力之權力。基於派系鬭爭的事實，蘇聯集體領導依賴官僚機構的權力平衡，以維持其型態的想法，不切實際。基於利害的衝突，蘇聯派系內部整合的程度不高；而個人控制機構的能力也非持續性。機構和個人權力相互糾纏的結果，常常引起派系間的鬭爭。

<sup>⑤</sup> Ploss, *op. cit.*, p. 44.

<sup>⑥</sup> Harnstone, "Toward a Theory of Soviet Leadership Maintenance," in Cocks, eds., *op. cit.*, pp. 51-52.

最後，就政策的層面看，儘管現代化的結果，使得蘇聯的決策過程日益複雜，但在蘇聯政治體系，決策仍在一個秘密狹窄的管道進行，共黨的干預也未終止。因此，政策的內容常常不能符合實際的需要。爲了使政策能付諸實施，用來證明決策的正確性，統治者最後則訴諸其個人的權力。

因此，我們可以如此結論：蘇聯自列寧以來的每一位共黨頭子，其領導政治的最大特色是獨裁，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史達林以前的統治方式，包括史本人在內，是不折不扣的「個人獨裁」統治方式；其繼任者則試圖動員羣衆，強迫他們自動給與政府支持，可以稱之爲「極權主義式的獨裁」。安德洛波夫和目前的契爾年科雖屬過渡領導，但權力集中化的傾向仍將繼續下去。同時，除非改變其整個制度，共黨的地位亦將繼續支配蘇聯的政治社會。